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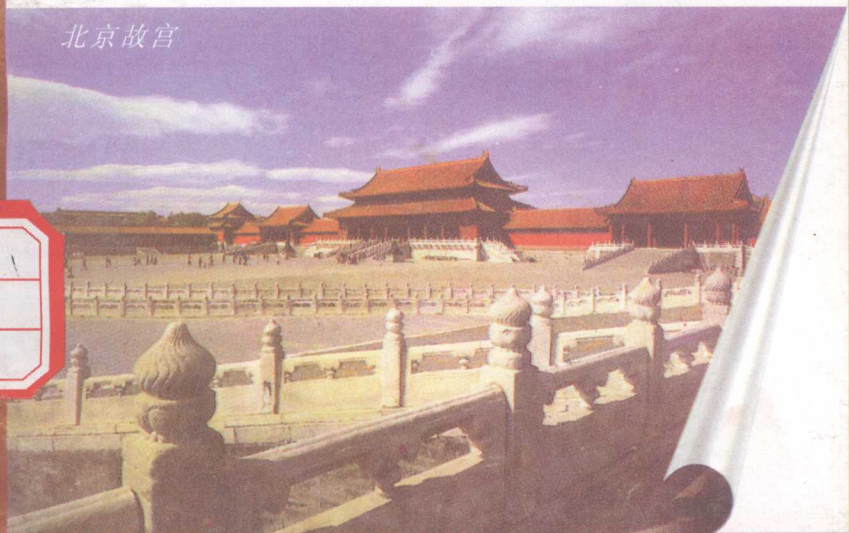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元世祖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北京故宫

27
4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元世祖小传

梁国楹 编著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梁 坚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元世祖小传

梁国樞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2001年10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2次印刷

ISBN—80521—843—9/K·113

I定价: 120元(全20册)

目 录

一、藩府延士	中原初治.....	(1)
二、拓土西南	争位塞北	(14)
三、南征北伐	一统华夏	(37)
四、鼎新革故	述祖变通	(67)
五、黜武嗜利	征外敛内	(85)

公元13世纪初，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在我国北方蒙古草原上兴起了。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正式建立蒙古政权。此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西伐西夏，南征金国，铁骑所至，攻城摧坚，无不胜数。公元1215年，蒙古开国勋臣、“四杰”之一木华黎先后攻占金北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都（今北京）等大小城邑862座，成吉思汗下令将所占城邑的钱粮器甲尽数北运。面对源源不断的财富和急剧膨胀的军队，成吉思汗感到无尚荣光。然而，让成吉思汗感到更高兴的是：这年8月，幼子拖雷之妻怯烈氏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孙子。正是这个孙子，继承祖业，60多年后终于完成了拓土扩疆、一统华夏的伟大使命。他就是元朝的创立者、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元世祖忽必烈。

一、藩府延士 中原初治

忽必烈，蒙古孛儿只斤氏族人。其父拖雷是成

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曾跟随成吉思汗西征，屡立战功。成吉思汗死后，按照蒙古幼子受产权习俗，他继承了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怯绿连河的遗产及军队，充监国。后召集“忽邻勒塔”（蒙古诸王聚会），遵成吉思汗遗嘱，推兄窝阔台（元太宗）继大汗位。蒙古灭金过程中，他入汉中，下河南，数败金将。公元1232年突然死于征金途中，年仅40余岁。长子蒙哥（元宪宗）继位后，追谥曰英武皇帝，庙号睿宗。成吉思汗生前，热衷于不断的军事征服战争，领军连年征战在外，拖雷以“也可那颜”（蒙古语，意为大官人，即官员之长）的身份屡充监国，因而有丰富的治国经验，这对忽必烈有很大影响。忽必烈的母亲怯烈氏，名唆鲁禾帖尼，为克烈部首领王罕之弟札阿绀孛之女，生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皆一世之杰。拖雷死后，她抚育诸子，统理部众，是拖雷系后来兴旺的依赖。她“英明溥博，圣善柔嘉”，“阴教纯被，妇职勤修”（《元史》卷116《后妃传》），在蒙古政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世界征服者》的作者波斯人志费尼称赞她“在教育子女、整饬朝政、维护尊严、处理事务等方面，明断英决，连戴头巾的男子尚且不及”。唆鲁禾帖尼一生笃信景教，崇奉道教、佛教，蒙哥继位后曾发布“懿旨”，

优待僧道。窝阔台分封的时候，以真定（今河北正定）作为唆鲁禾帖尼的汤沐邑，这就使真定以至河朔地区的汉族士人和拖雷家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唆鲁禾帖尼召过不少汉族僧道到漠北为她服务，使忽必烈早年就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熏陶。于是，北方知识分子为逃避战乱或抱有政治上的野心，纷纷潜迹于僧道之中，这对忽必烈以及日后忽必烈汉儒幕僚集团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少年忽必烈，胸有大志，才识过人，成吉思汗在世时就常常赞许他，认为他有志气，日后定有出息。成年以后，忽必烈强壮猛健，聪明机警，对中原文化倾心向往。公元1242年，忽必烈以藩王的身分征召海云禅师去漠北，海云携刘秉忠应召前往。忽必烈问海云禅师：“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吗？”海云告诉他：“我释迦氏之法，恐怕大王不能实行，还是应当寻求中原的大贤硕儒，向他们请教古今兴亡的道理，然后才有安天下之法。”海云禅师南还，刘秉忠却留了下来。刘秉忠，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字仲晦，青年时期英爽不羁，曾为节度使府令史，后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号藏春上人。他遍览群籍，既精于阴阳术数，又善治道，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类，样样皆能，“论天下事如指掌”，因

而倍受忽必烈赏识，很快便成了忽必烈藩府中最得力的谋士。刘秉忠根据历代封建统治经验，向忽必烈提出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大问题，并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制、整饬赋税、采用汉法，深得忽必烈赞同。忽必烈称帝后实行的各种制度，皆出自刘秉忠之手。同年，另一汉族知识分子赵壁也奉召来到忽必烈藩府。赵壁，云中怀仁（今属山西）人，字宝臣，曾跟随金末著名文人李微、兰光庭学习，精通儒术，才学俱佳，尽管当时只有23岁，但却被忽必烈称呼为“秀才”，深受信用。刘、赵等人跟随忽必烈左右，经常给忽必烈讲解中国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使忽必烈对中原先进的农业文明更加专注。当他听说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非常景仰。公元1244年，忽必烈30岁，步入了“而立之年”。多少年来一直“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也仿照唐太宗的做法，在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藩邸延请“藩府臣僚及四方文学之士”，向他们请教治国安邦之道。同年，他又派赵壁请来金末状元王鹗。王鹗为忽必烈讲《孝经》、《尚书》、《易经》及儒家的政治和历史，常至深夜，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无不陈于前”。忽必烈听得如醉如痴，

他曾神情严峻地说：“我今天虽然不能这样做，难道日后也不能吗？”公元1247年，忽必烈又召见了真定名士张德辉，向他请教为治之道。张德辉向他详细剖析了辽崩金亡的原委，特别指出了用人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不久，张德辉又向忽必烈推荐了李治、元好问等20余名时贤名儒。蒙哥继承大汗位后，为了进一步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忽必烈向蒙哥请求，免除了儒生的兵赋徭役。此后，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如姚枢、窦默、许衡、张文谦等人纷纷拥入忽必烈藩府，竞相为之所用。姚枢，洛阳人，金亡后至燕京，为行台郎中，不久弃官居辉州（今河南辉县），与许衡、窦默讲习理学。忽必烈不仅自己努力接受、学习汉儒文化，还一再要求其他蒙古贵族也要跟着学。他的儿子真金（忽必烈继汗位后为太子），从小就跟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后来当上中书左丞的阔阔，当时为忽必烈藩府正侍，忽必烈让他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忽必烈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士儒为主的幕僚集团。可以说，这是忽必烈日后采用汉法治理天下及霸业成功的基础。

公元1251年6月，拖雷长子蒙哥在术赤（成吉思汗长子）长子拔都和大将兀良哈台等人的支持下继承汗位，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手中。蒙

哥同母弟中，“最长且贤”的当属忽必烈，为了把全国权力确保在拖雷系家族手中，蒙哥继位后不久，即把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部委托给忽必烈掌管。漠南汉地富冠蒙古国的各个地区，且人口众多，拥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无论人力或是物力，都使忽必烈获得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因此，当忽必烈听到消息后，喜不自胜，想摆宴庆贺。足智多谋的姚枢当即劝谏，提醒他不要喜形于色，而要深藏不露，否则，有人从中离间的话，大汗必然会反悔而收回大权。忽必烈马上采取了他的建议，取消了欢宴之举。同时，为了更有利于接近汉族人士，加强对漠南的控制，忽必烈把藩府向南移到了桓州（今内蒙古正黄旗）一带。公元1252年，忽必烈又在桓州金莲川（今河北沽源）开设幕府。继续召聘汉族儒士和官吏。当年，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郝经应忽必烈之召来到忽必烈藩府。郝经家贫好学，读书甚丰，金亡后徙居河北，为人宾客。他认为：“战乱40多年了，谁还能重用文士呢？今天忽必烈重用文士，倾心中原文明，日后必能成为中国之主。”所以慨然启行，从顺天来到金莲川。忽必烈向郝经询问经国安民之道，郝经书面条陈“数十事”，忽必烈大悦。自后，军政要务无不征询其意见。

然而，当时忽必烈所面临的漠南汉地的情况却极为严峻，土地荒芜，人口流失，“汉地不治”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蒙古军进入中原之初，把掠夺财物和人口当作主要目标，采取了野蛮的戮掠政策。例如，自公元1213年11月至次年正月，蒙古兵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连破金之河北、河东、山东等90余郡，所破之地，“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公元1213年12月，蒙古军攻陷保州城，在抢掠财物的同时，对男女老幼尽为杀戮，只有少量工匠能够幸免。蒙古贵族别迭甚至公然宣扬：“汉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应该把他们的农田清理一空，以作为牧地。”虽然在耶律楚材的力谏下，这种政策未能实行，但成吉思汗时代，北方农业生产却陷入了停顿、倒退状态。

窝阔台继位后，按照耶律楚材的建议，进行了一系列剥削方式上的改革，征收地税、商税以及酒醋盐铁山泽等税。公元1230年，耶律楚材奏请设立了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阴、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课税所，正、副使都委派儒士担任。第二年秋，窝阔台至西京（今山西大同），

耶律楚材将征收到的银币、米谷、簿籍陈放到他面前，一共是银 50 万两，绢 8 万匹，粟 40 万石，数量与上年耶律楚材建议赋税改革时所许诺的相吻合。窝阔台大喜，笑着对他说：“一年来，你始终不离我左右，怎么能聚集到这么多钱谷呢？不知道南国是否还有你这样的人才！”并亲自为耶律楚材倒满一杯酒，以示庆贺。事后，窝阔台把中书省大印授给他，“事无巨细，一以委之。”（《元文类》卷 19，《耶律楚材神道碑》）。公元 1235 年，窝阔台下诏括编中原户口，以失吉·忽秃忽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极力主张以丁为户、按丁定赋，耶律楚材则主张以户为户、按户定赋。最终，窝阔台还是接受了耶律楚材的主张，让他主持制定了中原赋税制度。耶律楚材的改革，其宗旨是以中原地区行之已久的赋税办法来代替蒙古贵族杀掠式的和无限制的不时需索，以确保大蒙古国的财政收入，稳定蒙古政权在汉地的统治。自诩为“治天下之匠”的耶律楚材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明主初登极，愚臣敢进狂。……举我陪三省，求贤守四方。锦衣捐毳褐，肉食弃糟糠。隐逸求新仕，流亡集故乡，百官欣戴舜，万国愿归唐。耕钧咸生遂，工高乐未央。全将封泰岳，行看建明堂。”（《湛然集》卷 9，《和张敏之诗七十韵》）。但

是，耶律楚材的改革却受到了蒙古贵族守旧势力和斡脱势力的双重阻挠。斡脱，突厥语，意为“同伴”、“商帮”，当时专指西域商人。从成吉思汗起，斡脱已在大蒙古国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往返于中原、漠北及河中等地，进行商业活动。由于蒙古贵族不善理财，于是便把掠夺来的钱财交给他们去做生意或放高利贷。斡脱放的高利贷，利息高达100%，年年本利倍增，称“羊羔儿息”，不少家庭因之而破产。耶律楚材请以官银代还民间欠债七万六千锭，并规定今后不论债务多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对斡脱高利贷剥削进行了很大的限制。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张，蒙古政权的财政需求也随之扩大。窝阔台晚年，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同意西域商人奥都剌合蛮等扑买课税，由西域商人支付高出某种税额的银两以取得某种税目的征收专利权。这些人取得专利权后，往往以各种手段获本取利，弄得民怨鼎沸。耶律楚材极力反对，但窝阔台还是在公元1239年任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官，让他掌握了汉地财赋大权，耶律楚材改革失败。漠南汉地重又回复了旧的剥削方式。奥都剌合蛮总领诸路课税后，迫使诸道增加课税，不仅将扑买所增税额完全转嫁到人民头上，而且额外多取，从中牟利。

公元1241年窝阔台去世后，皇后脱列哥那（即乃马真）摄政。公元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继位，实际上脱列哥那继续掌握国政。两年后，贵由在西巡中死去，拖雷系诸王与窝阔台系诸王激烈争夺汗位，致使大蒙古国“三岁无君”，诸王、后妃、贵族等乘机大肆搜括，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无不在其勒索之列。此间，蒙古政局混乱，赋敛无章，法度不一，内外离心，漠南汉地尤为突出。蒙哥登位伊始，颇有革除积弊之势，下令：凡是先朝及诸王滥发的牌印、诏旨、宣命，全部收回；诸王外出限乘三匹马，远行也不得超过四匹；诸王不得擅自征招民产；诸官属不得以朝觐为名赋敛民财；除成吉思汗特免的木速蛮、也里可温、和尚、道士外，斡脱、官吏等均按其财产交纳贡赋；汉地人民按贫富情况交纳不等的赋税；人民交粮时，允许在最近的仓库交纳。显然，蒙哥上述一系列旨令不过是一般性的应急措施而已，并没有针对中原汉地的特殊情况从根本上进行制度上的变革。从思想意识上看，蒙哥和其先人一样，仍然以漠北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中心，而把汉地只看作蒙古国的东南一隅。他没有意识到漠南汉地雄厚的经济力量、众多的丁男，在蒙古国中应当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在任官用人上，蒙

哥仍以蒙古贵族为主，牙刺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先后担任燕京行省长官，这些人几乎全是窝阔台晚期主管财赋的聚敛之臣。蒙哥在漠南汉地还实行了为害甚深的包银制度，起初，每户征银 6 两，由于汉地官员力争，后改为 4 两。包银制度的实行，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人民交纳不上足够的包银，被迫向西域商人借贷斡脱钱，至期不能偿还，转子为母，愈积愈多。由于债务累累，人民纷纷逃亡，因此，中原地区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

忽必烈掌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后，面对“汉地不治”的情况，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赋等一系列措施，并任用熟悉汉法的宋金官僚、知识分子进行统治，初步扭转了这种局面。

忽必烈对漠南汉地的治理首先是从整饬邢州（今河北邢台）入手的。公元 1251 年，受封于邢州的两个翰鲁纳氏答剌罕（意为“自在之人”，蒙元对有功权贵的封号，享受免罪、选择牧地、拥有战俘等特权）向忽必烈报告说：“我们刚受封到邢州时，尚有人户 1.5 万之多，但近年来由于兵乱及贪吏盘剥，百姓四处逃亡，人口月月减少，现在只有五、七

百户了。所以，请赶快选派良吏来邢州整治。”于是，忽必烈以脱兀脱、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他们到邢州后，洗涤蠹敝，革除贪暴，招抚流亡，同心协力，务在安民，几个月后，人口便增加了10倍。忽必烈由此更加器重儒士。当时，漠南汉地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贵族、官吏在地方上随意杀人的现象经常发生。蒙哥的断事官牙刺瓦赤、不儿等，一天内判决28人死刑，其中一人因盗马杖刑后释放了，但后因要试刀，又追回来斩了。忽必烈责问他们：“凡是死罪，必须详细审查后才能行刑，今天一次就杀了28个人，肯定不少是无辜的，至于先杖后斩，这又是哪家的刑法呢？！”

公元1252年，南宋军队进攻宋蒙之界的河南之地，使本来就很严峻的河南形势更加混乱，人民逃亡之风日渐严重。忽必烈向蒙哥提出，在汴京设立河南经略司，把河南地区交由他试治，得到蒙哥准允。忽必烈任命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壁为经略使，陈纪、杨果为参议，共同整饬河南。史天泽，金朝永清（今属河北）人，成吉思汗时随父降蒙古，为真定都元帅，窝阔台时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随窝阔台灭金，功勋卓著。史天泽等人到河南后，惩治了贪淫暴戾的河南道总管、

万户刘福，并将两个作恶多端的州县官处死，兴利除害，均平赋税，甚得民心。忽必烈还建议在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等地组织兵民屯田，并在邓州设立屯田万户府，屯田范围西起襄、邓，东至清口、桃源。屯田士兵从官方领取耕牛、种子，“敌至则御，敌去则耕。”这样一来，既巩固了蒙古在河南的统治，安定了民心，同时也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经过治理，残破的河南经济得到了部分恢复，仓库的粮食也开始有了剩余，部分流亡人口开始返回故里，社会秩序明显改观，河南一时号称“大治”。

公元1253年，蒙哥分赏诸王，忽必烈得到了京兆封地。关中本是“厥土上上”的宝地。但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屡遭兵燹，破坏严重。当时，诸将皆在关中建筑府第，豪侈相尚，8州13县户不满万，驻军横暴，杀夫夺妻之事时常发生。忽必烈受封后，首先整顿军纪，分遣集中在关中的将领到各州去戍守，然后在凤翔（今陕西凤翔）屯田，以河东解州（今山西运城）之盐交换民粮，以供军食。同年夏，派遣王府尚书姚枢到关中建立京兆宣抚司，任命李兰、杨惟中为宣抚使。同时设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币。杨惟中等人到任后，整顿吏治，奖励农桑，减